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一、嫉恶如仇 追求真理

1899年8月21日，方志敏诞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世代农民的大家庭里。

此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军阀混战，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方志敏的祖父方长庚老人，带领全家40余口，男女老幼终年劳作，除交地租外，所剩无几，勉强维持温饱。父亲方高翥，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母亲金香莲，善良谦和，是持家勤俭的妇女。方志敏还有姐姐、弟弟、堂兄弟等，他们后来多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方志敏从7岁开始放牛，拾粪和割草，养成了刻苦耐劳的好习惯。他还乐于助人，敬老恤贫，乡亲们都称赞他是个好孩子。如路上遇见老人上坡下坎，不论认识与否，他都会搀扶。村里孤寡老人生病无人照料，他就代为买药和送水送饭。

方志敏8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尽管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乏味的很，但他深知祖父和父母供他读书是多么不容易，因此仍十分用功。他1年就学完了3年学业，1年读的书是其他学生的3倍。他还练就了一手好字，10岁就能写简单的文章。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发生，虽然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取代了封建帝制的清王朝，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贪官污吏照旧欺压老百姓，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劳苦大众照旧过着苦难的生活。

漆工镇有个老财主邵襄臣。他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在镇上开了个“鼎丰商号”，兼放高利贷，负债的人被逼得家破人亡。

1912年腊月底，方志敏去探望姐姐。路过一个村庄，听见粗重的吆喝声和悲切的哭泣声。他前去一看，只见鼎丰商号的账房带着狗腿子，手拿算盘、帐本，在向一位穷寡妇厉声逼债。这位寡妇几年前因头痛无钱买药，向鼎丰商号赊了几尺黑纱布来包头。没想到，几年的苦苦劳动竟无法偿还这几尺黑纱的高利贷。狗腿子不顾老婆子苦苦哀求，要把她的破被、锅、碗、盆、勺夺去抵债。

少年的方志敏见此惨状，气愤极了。到了姐姐家，向姐夫说：“邵襄臣太坏了，总有一天要死在我手里，我要败他的家！”

方志敏咽不下这口气，总是想着，怎么败他的家呢？

大年初一，邵老板天没亮就起了床。今天他要亲自开门，想要成为全镇第一个“开门大吉”、“招财进宝”的人家。

天刚亮，第一阵鞭炮声响了，红蜡烛点好了。邵老板身穿崭新的长袍马褂，头戴黑缎红顶瓜皮帽，得意洋洋地走到大门边，双手小心异地搬下顶门杠，又毕恭毕敬地拉开门栓，打开紧闭的大门。骤然间一股恶臭扑面而来，一大把沾满粪污的稻草扫帚倒了下来，粪污溅了他一脸一身。他慌忙后退，脚一滑，又摔了个四脚朝天。扫帚把贴着两张纸条：“抬头见鬼”、“开门招灾”。他气得浑身发抖。店伙计捂着鼻子笑着走出大门。漆工镇上很快荡漾起一片开心的笑声。至今，漆工镇的人们谈起此事，仍然津津乐道。尽管邵襄臣本人不知是谁干的，但乡亲们知道是志敏干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方志敏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了。他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对军阀混战非常痛恨。因此，1916年在弋阳县城叠山书院的高等小学

读书时，与同班同学邵式平等组织“弋阳九区学社”，积极从事爱国活动。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1918年，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卑躬曲膝，承认日本在山东取得的特权。很快激起了全国反帝爱国热潮。方志敏组织集会，邀请青年教师俞谟讲演。俞谟在讲台上讲读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声音由低变高，渐渐怒吼起来。讲到痛心之处，禁不住用拳头把桌子捶得砰砰响。此时，方志敏再也忍不住，带领大家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惩办卖国贼”等口号，群情激愤。俞老师讲话刚一结束，方志敏就跳上讲台慷慨陈词：“这个日本狗强盗野心像恶狼，《北京专约》吞并琉球；甲午之战又夺去我辽东、台湾和澎湖列岛；现在又提出“二十一条”，想进一步亡我中华民族，我们要打倒日本狗强盗，打倒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伙狼心狗肺的卖国贼！我们每个有良心、有民族热血的青年学生，都要赶快觉醒，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国贼，抵制日货，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决不让国土沦丧，决不让自己和子孙后代做亡国奴……”

方志敏充满激情的即兴讲演，像大江长河一样，滔滔不绝，奔腾豪放。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波及全国，弋阳县也掀起查禁日货的热潮。方志敏首先将自己用的日本制的全部日用品拿到大街上砸个稀巴烂，又当众烧掉他好不容易买的日本席子。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同学也纷纷跑回宿舍，翻箱倒柜，找出日货，统统毁掉。知道方志敏家境的同学说：“你把东西全毁了，今后怎么办？”他说：“没有用的我不用，没有睡的就睡在床板上。”而且发誓：“以后生病，就是病得要死，也决不买日本仁丹和清快丸！”接着他们又组织几个日货查禁组走上街头，把从商店里、货场上查出来的日货全部烧毁。方志敏和同学们的做法，虽然有些偏激，但完全是出于赤诚的爱国之心。

这年秋天，方志敏怀着工业救国的想法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

在当时，该学校算是一所高等学府，但教学质量实在太差。教机械的教师不会修发电机，教英语的教师不但英语发音极不准确，而且讲课毫无内容。而校长赵宝鸿在学生面前偏偏要夸奖这些“饭桶”教师，使学生极为反感。

为此，方志敏编写了出一讽刺喜剧，在辛亥革命9周年纪念晚会上演出，博得观众哄堂大笑和阵阵掌声，同时使赵宝鸿和“饭桶”老师们无地自容，狼狈不堪。

赵宝鸿贪污建筑材料和资金，为自己盖了漂亮的住宅，使刚建不久的校舍屋漏墙塌。此外，学校还贪污学生缴纳的学杂费和伙食费。

学校的这些腐败内幕经学生自治会多方调查，公布于众后，激起了师生们的极大愤怒。大家一致推举方志敏等人为学生代表，向校方提出严正抗议和要求。“这是煽动学潮，如不收敛，将严惩不贷。”老奸巨滑的赵宝鸿以高压手段进行威胁。

方志敏等学生代表针锋相对：“学生争取合法权益，理所当然！”

赵宝鸿恼羞成怒，竟决定开除方志敏等人的学籍。这更激起了甲工师生们的强烈义愤，他们高喊“开除校长赵宝鸿”的口号，结队上街游行，并冲进了赵宝鸿的家，为方志敏等人鸣不平。

赵宝鸿请求省府派兵平息学潮，校园内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非常恐怖。但学生们并没有害怕，他们仍四处游说，揭露和痛斥赵宝鸿的可耻行径。搞得赵宝鸿惶惶不可终日。

赵宝鸿又想出更歹毒的一着，突然宣布“学校提前放假”。这给斗争造成极大的困难，斗争有夭折的危险。方志敏立即召开学生自治会议，组成宣传队，上街游行，得到全市各界的支援和响应，学潮越闹越大。赵宝鸿在全市学生一致行动的压力下走投无路，不得不辞去了校长职务。

1921年，方志敏考入九江南伟烈大学。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学生每天都要做礼拜。这里的教师也和甲工一样“饭桶”。有些教师和学生崇洋媚外的丑态，使方志敏痛心，加上日常所见帝国主义的军舰耀武扬威地在长江里航行，黄头发高鼻子的洋人，任意欺侮中国老百姓……这些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知道家里节衣缩食供他来九江上学，不管环境怎样糟糕，如果不认真学习，就对不住父母，也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刻苦用功，成绩一直列全班第一。在甲工两年他是全校为数不多的免交学费和伙食费的学生之一。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他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组成读书会，学习《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阔了眼界胸怀，思想产生飞跃。他经常与同学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同学亲切地称呼他“社会主义”，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在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权益分配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上，北京卖国政府训令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向日本让步。消息传来，全国激愤。九江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方志敏成为当时爱国运动领导人之一。

方志敏由于家庭困难，实在无钱继续供他上学，加上他在弋阳小学传染上的肺病一直未愈，遂自动退学回家养病。待病好转，他决定去上海，寻求生活出路。

方志敏从家乡九江，乘一艘外国轮船顺江而下。正当他在甲板上扶着栏杆远望，忽然传来“饶命呀！”“饶命呀！”的叫喊声。他扭头一看，两个查票的彪形大汉，捉住一个骨瘦如柴、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中年男子。查票大汉听了洋人大班的吩咐，把那个没钱买票的男子，用绳子捆住腰部，悬吊在船舷外，任江水抽打。方志敏见状，大声质问：“住手！你们要干什么？”那查票的汉子说：“谁叫他不买船票！”“他虽买不起票，但也不能拿人命来顶呀！”在围观群众的谴责下，那穷汉虽然被拉了上来，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这一惨状使方志敏痛心疾首，终生难忘。

方志敏只身来到了上海。一天，他走到一个公园，见到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他停住了，从未遇到过的欺侮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的灵魂被亵渎了。

方志敏在《先驱》编辑部偶然会见了仰慕已久的恽代英、向警予。结识了赵醒侬、罗漫、徐先兆。他们4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和《先驱》等进步刊物。方志敏在《觉悟》上发表了散文诗《哭声》、《呕血》等作品。

经邵力子的介绍，方志敏在《民国日报》担任了校对工作，生活有了着落。赵醒侬通过恽代英，把方志敏安排在上海大学社会系旁听。更使他高兴的是，经赵醒侬介绍，他秘密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二、峥嵘岁月 坎坷征途

1922年9月初，方志敏愉快地接受了组织的决定，肩负重任，又回到了南昌。

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一个刚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22岁的方志敏，在南昌没有任何工作基础，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想办法，独挡一面地开辟工作，困难重重。但他坚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方志敏首先办起了“南昌文化书社”，并自任经理。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解决了困难最大的经费问题。

书社虽然门面不大，书籍却名目繁多，有很多进步书刊，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书社越办越红火，方志敏忙得不可开交。后来由于敌人实行高压政策，禁止他们传播进步思想，书社也被查封了。组织上见方志敏有被捕的危险，便暂时安排他去了南京。

1924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他生命中新的一页。

此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根据党的决定，方志敏等都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中共中央直属江西省特别支部领导国共两党合作的一段时间里，江西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社会各界的活动都开展起来了。方志敏决定到农村去开辟新的战场。

方志敏首先来到南昌市郊区的扬子洲。这里的农民被地主压榨得喘不过气来，家家是“镰刀墙上挂，锅里没米下”。有的四五口之家，吃穿用全部家当，一担子就可以挑走，可见农民是多么穷。

方志敏走村串寨，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访贫问苦，发动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会，维持自己的生存权利，得到农民的热烈响应。

扬子洲农民协会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贫苦农民掀起了抗租、抗债、抗税的运动。同时，方志敏又回到弋阳家乡农村，向农民宣讲共产党的政策，培养农运骨干，建立农协机构；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从此，弋阳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了。

1926年4月末，方志敏作为江西省农运代表，去广州出席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他听到了北伐军雄壮的歌声；见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农委书记、大会主席澎湃，并聆听了他具体生动的报告；参加了公祭黄花岗活动，悼念了死难的烈士；参加了向广东革命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北伐等一系列活动。

11月，方志敏担任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委会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主持全省农运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江西农运工作发展迅速，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进军江西。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时全省农协组织扩展到54个县，农民会员人数已发展到30多万。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把方志敏当成眼中钉。但方志敏并没有被吓倒，每次省农协开会时，总要与他们一争高低，寸步不让。

1927年2月20日，方志敏在江西农民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并作了《会务总报告》，挫败了段锡朋等国民党AB团的贿选活动。方志敏又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负责主持全省农协的全面工作。

此时已是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农委书记的方志敏，指出对段锡朋等国民党AB团破坏农运的行径，应采取对策予以反击的建议，但得不到当时区委主

要领导人的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他们妄图以“圈定”的手法，将方志敏排斥在外，夺取省农协的领导权。

方志敏对段锡朋等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得到了中央农委毛泽东的坚决支持。经过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

江西省的农民运动更加汹涌澎湃，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粉碎。一贯欺压穷人，抢男霸女的土豪被公审枪决；对敲榨人民血汗的劣绅进行彻底清算；农协会召开2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披着神父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并将其当场处决……。这时的江西农村真是翻天覆地，农协会在农村“说得出，做得到”，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

国民党右派视农民运动如洪水猛兽，亮出了早已磨好的屠刀，向革命人民杀过来了。1927年3月，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他们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捣毁了国民党左派党部；搜捕工人纠察队，队长曹炳元惨遭杀害；工人被打死20多人，市民伤60多人……。

面对一件件反革命暴行，方志敏心情非常沉痛，决心制止反革命暴行，严惩右派。

在中央农委扩大会议上，方志敏完全赞同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民武装，打击地主武装的主张。他联合各方面代表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向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发起请愿活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

4月2日到3日，南昌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一致要求严惩AB团。刚从武汉返回南昌的方志敏，立即投入战斗。游行队伍在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的配合下，AB团分子几乎全部就擒。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革命志士。李烈钧在上饶，朱培德在南昌与蒋介石遥相呼应。严酷的现实，使方志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不能对国民党抱有任何幻想了。因此着手筹建省直属农协的自卫武装。在当时南昌市公安局朱德的支持下，方志敏得到了100多支枪，武装起一个中队自卫军。全省各县农民自己也纷纷武装起来了。方志敏将队伍开到涂家埠，土匪恶霸早已逃之夭夭；豪绅地主被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的家财、粮食被没收，分发给穷苦民众。

省农协自卫队初征告捷，各地农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在省农协和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支持下，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农民自卫军，群情高昂，军威大振。

然而这些却招至中共江西区委刘九峰等人的指责，批评方志敏说：“友党对枪特别不放心，你要把所有的枪都交出来！”方志敏打断刘九峰的话，大声说道：“这是谁决定的？手无寸铁，让我们任人屠杀？他们要是放心了，我们就不能放心！”刘九峰等人却说：“这是根据陈总书记的指示决定的。统一战线是个大局，出了问题你要负责……。”方志敏气愤地答道：“难道烈士的血就白流了吗？你们看得下去，我可看不下去，交枪你们先去问问民众，问问牺牲的同志……。”方志敏用铁的事实驳得赵九峰等人无言以对。他们见无计可施，竟卑鄙地采取组织措施，给方志敏以党内警告处分。但方志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就是不交枪。

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了全党，各地农民自卫队武装被解散，反动派反扑过来。被抓获的AB团分子被释放了；各地曾无影无踪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又回来了；残杀革命志士的事件不断发生，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在艰苦的岁月里，方志敏与南昌市女子职业学校的高材生缪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缪敏是方志敏的同乡，一位朴实漂亮的农村姑娘。她经常协助方志敏进行革命活动，并加入了青年团。6月5日，为躲避敌人追捕而暂住区委秘密机关的方志敏，与缪敏举行了婚礼。他们虽然一无所有，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联在了一起。澎湃和新上任的江西区委书记罗亦农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赣江水面笼罩着晨雾，方志敏化装成教书先生模样，乘小船秘密驶向吉安。缪敏站在江边，满含热泪，挥动着手帕，凝视着新婚丈夫远去。

三、弋横暴动 创建苏区

7月中旬，武汉汪精卫一伙也公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了。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8月中旬，方志敏闻知“八一”南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精神极为振奋，决计返回弋阳，发动秋收暴动。

方志敏夜里潜回弋阳，悄悄地回到家里。

“妈妈，我回来了。”“孩子，是你哟，怎么深更半夜……”

母亲见是日夜思念的儿子回来了，话还没说完，已经撩起衣襟揩起眼泪，又忙着点亮油灯。父亲也起来了，消瘦棕黑的脸，布满了皱纹，这几年父亲老多了。他走到儿子面前，低声而沉重地说：“回来了，到底回来了！在外面担惊受怕呀！”方志敏听到家乡的惨变，尤其是听到方远杰牺牲，不禁流下了眼泪。“你在外面，家里担心；回到家里，也是害怕。哎！你今后如何打算哪？”老父亲紧皱眉头发愁地问。“不走了！”方志敏低沉而坚定地答道：“一定要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几天后，方志敏在来龙山蓬家坞一个山棚里，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蓬家坞会议”。不久，他在弋阳、横峰两县重新组织了20多个党支部，农民协会也成立了20多个。方志敏到处秘密搞枪，准备秋收暴动。

对此，反革命分子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大劣绅张念诚乘“八一起义”时的混乱跑回来了，他串通地主豪绅反攻倒算。九区农民奋起反抗，他就收买一个营的反动军队前来镇压。敌人纵火焚烧村庄，湖塘村一片火海。

10月底，我党在“波阳会议”上决定武装起义。方志敏开完会后，赶紧返回弋阳九区。这时，方远辉和黄镇中已带着300多人的暴动队，等待着方志敏下达命令。

11月1日深夜，起义的命令下达了。各农民革命团精神抖擞，人人磨拳擦掌，拿起梭镖、大刀、鸟枪、锄头、扁担，在方远辉和黄镇中的率领下，星夜向烈桥进发。沿途群众听说是搞暴动，打张念诚，都纷纷自愿参加。队伍一下子扩展到了3000多人。他们一举攻克了张念诚的老巢烈桥镇，张念诚和爪牙们逃跑了。革命群众打开他的仓库，分了他的粮食，焚烧了他的田契和借据。

弋阳九区暴动胜利不久，方志敏化装成商人来到横峰楼底兰家村。

该村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与村民开了个小煤窑，每天脱得一身精光，在臭气熏蒸的煤洞里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非常辛苦，爬出洞来，一身乌黑，不像人样。但即使这样用命换来的几个钱，县衙门每月都要抽走一大

笔捐税。

腊月初九这一天，一个县衙门催税的委员来到这里。这家伙十分傲慢，出口骂人，强行收税，煤工们和他争辩起来。他理屈词穷，动手打人，被兰长金上去一挡一拉，摔了个狗吃屎。这家伙一见势头不对，起来拔腿就跑，边跑边喊：“老子叫兵来，明天和你们算帐！”

锣声响了，革命团集合起来。队伍越来越大，有 100 多人，准备明天把官兵杀个人仰马翻。他们请回正在弋阳九区开会的方志敏作起义总指挥。

夜半三更，暴动队伍举着松明火把，由兰长金带领，向大地主罗广生家冲去。先抄了他的家，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烧毁了田契和债约。而后又到其他地主和高利贷者家去收缴各种契约和借据，并把他们严加看管起来，吓得地主老财们一个个浑身哆嗦。

第二天早晨，横峰县衙门果然派来了 10 多个警察，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捉拿“凶手”。事前方志敏决定由花春山应付这个场面，来个“宴会擒敌”。花春山一见到警察，就连赔不是，并杀猪宰鸡办酒席，“殷勤”款待这些警察们。当酒过三巡，这些家伙昏昏欲醉的时候，埋伏在四周的农民革命团团员，一拥而上，10 多个警察束手就擒，缴了枪械。

1928 年 1 月 2 日，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窑头村成立了以方志敏为总指挥的暴动总指挥部。

由于“窑头会议”决策正确，农民革命团的发展异常迅速，不到 10 天就又组织起 200 多个，人数达 6 万多。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像潮水一样向各自目标进发。

农民军节节胜利，在弋阳、横峰纵横 100 多里内，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反革命分子一批批被逮捕镇压了；反动军队和警察躲在城里不敢出来。农民革命团就是“劳农政府”，贫苦农民当家做主了。

弋、横农民大暴动，震惊了南昌政府。朱培德急忙增派一个团的兵力，进驻紧靠弋、横的铅山河口镇，又联合广信 7 县反动地主武装，大举向暴动区域进攻。

方志敏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对策，组织退却，保存了有生力量。经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弋阳县委，方志敏任书记；创建了赣东北第一支正规武装——工农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十四团一营一连；成立了弋阳和横峰两县苏维埃政府。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使敌人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向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疯狂进攻。

情况紧急！方志敏为统一思想，在 1928 年 6 月 25 日，召开了“万胜峰会议”。会议批评了个别人主张埋枪逃跑的想法。根据会议决定，由邵式平指挥根据地军民，埋伏在金鸡山附近，准备与敌人大战一场。

敌人出动了！村庄被他们洗劫一空后，又放火烧掉，浓烟滚滚，足有 10 里多长。战士们望着被烧毁的家乡，心都炸了。

满山遍野被敌人驱赶的群众过去了，后面的敌人紧跟上来。邵式平一声大喊：“同志们，冲啊！”一连从后面抄过来，冲杀过去；几百名农军，挥着大刀长矛又杀了过来。两面夹击，敌人乱了阵。这时前面被驱赶的群众，转过头来呐喊助威，帮助一连战士和农民军。喊杀声震天，吓得敌人魂不附体，丢盔卸甲，只顾逃命。

邵式平和吴先民领着队伍一气追击 50 多里，直逼弋阳城下，县长闻风逃

跑，城里的豪绅、地主、官僚政客、奸商巨贾、太太小姐，也跟着逃命，拥挤着抢过信江浮桥，不少人被挤下河淹死了。横峰县长也吓得慌慌张张地躲到河口镇白军据点去了。

紧接着，又在樟树墩和胡家墩伏击两路敌军，都取得了胜利。

同时，方志敏主持的争取群众、巩固政权、镇压反革命的行动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四、奋力拓展 西进瓷都

1928年7月下旬，方志敏为察看地形，筹划革命大计，来到贵溪周坊。

方志敏本想再深入更多的乡和村，再做些调查研究，但形势已经不允许了。敌人又已重新集结兵力发动第二次局部“围剿”。

军情紧急，方志敏匆匆赶回弋阳，立即召开红军干部会，讨论如何打退白军的这次“围剿”。会上，方志敏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避强敌，寻战机，然后出其不意，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方针，得到大家的赞成。

邵式平领着队伍跟敌人逗圈子，看准了时机，就集中兵力“游击”敌人。几次游击战都获成功，敌人慌了，忙着部署防守，不敢再进攻。9月24日。在冷水坑截击战中，击溃敌人两个连，击毙20多人，缴枪10余支。继而在龙浆平又打了个伏击战、在登火坑打了一个夜袭战，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

10月，方志敏到万年县主持党的“葛茅坞会议”，部署万年县的农民暴动。

11月26日，德兴县18个村子农民暴动，弋横苏区逐渐向德兴伸展40余里。

12月5日，方志敏出席了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邵式平根据方志敏在会上提出的“在敌强我弱的艰苦环境里，要不惮艰辛地进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的意见，积极开展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12月底，匡龙海率周志群部十一连70余人起义；敌十二连士兵哗变。接着周志群的三营有3个连先后起义和哗变，投奔红军。这样一来，敌人的这次“局部围剿”便不攻自破。与此同时，红军十四团的力量壮大一倍以上。

1928年底，方志敏二上贵溪，代表省委宣布成立中共贵溪县委后，便返回弋横苏区。1929年2月，他主持召开信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得到省委批准，成立信江特委。

5月26日，经方志敏建议，召开了贵溪、余江、万年3县党员会议。会上总结了前一阶段工作，决定以周坊为中心，全面开展农民运动。

方志敏回到弋横不几天，周坊农民暴动就掀起了。农民革命团一鼓作气打垮了周坊豪绅武装——反动团练，革命红旗在周坊上空迎风飘扬。

几天之内，暴动在三县边界60多里的范围内同时爆发，人数达7万多，直逼3县县城。

7月，白军王钧部，纠集广信、饶州10余县的豪绅地主反动派“联合围剿”革命队伍。他们认为红军和群众藏身之地是山林，如果把树砍光了，失去藏匿之所，就不难一网打尽。他们异想天开，茫茫林海何时才能砍光呵！当他们发现“砍树围剿”方案实在荒唐可笑，恼羞成怒，又在十几个村子放起火来。

这时，正是秋收季节，在弋阳的信江以北地区又全面掀起秋收暴动，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扩大苏区 100 多里，苏区人口增加 8 万多，弋阳县城已成一孤城。同时，德兴苏区扩大 1 倍以上；横峰苏区也向外扩展不少。

1929 年 10 月 1 日，由方志敏主持的信江 8 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九区邵家祠堂召开。大会选举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 72 人为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方志敏任主席。

信江特区苏维埃成立以后。摆在方志敏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但解决土地分配问题是关键。

11 月 12 日，信江第一次工农兵大会决定的《临时土地分配法》，以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在信江所属的 8 县各村“布告”周知了。

布告发出以后，雇农、贫农眉开眼笑；中农心里安稳；富裕农民解除了怕“没收土地，打烂平分”的顾虑；就是地主豪绅也感到“只要自己遵守法令，重新作人”，也有生活出路。

11 月下旬的一个中午，政府在三板桥村晒场上发土地证。贫苦农民接到土地证时的高兴样子，是无法形容的。

就在贵溪城下分田分地的时候，敌十八师一个连及靖卫团又向周坊围攻，清乡局长、反动地主邵善德也跟着回来了。他们纠集一批豪绅地主，集中枪支，成立“清乡团”，派出“清乡队”，进行“清乡运动”，反攻倒算，极其残忍地杀害分田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有的农民把分到的田又退回地主。

正在万年县发起 48 个乡暴动的方志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他星夜赶回贵溪。

方志敏了解了敌我态势，决定立刻做好两件事：一是举办游击队训练班，成立游击队；二是开展“反清乡运动”，打掉“清乡团”，严惩反攻倒算的豪绅地主，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

在 12 月“反清乡运动”中，方志敏深入被敌人占领的周坊，智擒豪绅地主的故事，至今仍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那一天傍晚，周坊一带路上行人已稀。方志敏化装成白军军官，穿一身黄制服，戴一副茶色眼镜，骑一匹大白马，带领十几个“卫兵”——好威风！一路上碰到靖卫团团丁，都向他举手敬礼。进村后，方志敏叫“卫兵”们号房子，同时吆喝着，“大军”明天就到。村上的豪绅地主信以为真，纷纷跑来打听消息，大献殷勤，并准备酒饭，为“长官”接风洗尘。

“你们是干什么的？”方志敏问。

“我们都是本村人。”两个地主答道。

“都是财主？”方志敏又问。

“岂敢！岂敢！”两个地主满面堆笑地答道，并连连鞠躬说：“长官有请！”

方志敏连理也不理，用皮鞭指着一栋青砖粉墙大屋，对“卫兵”说：“把这栋房子也号上，住一个连！”

“这房子是我的！”一个地主赶忙声明。

“不管是谁的都得号！”一个“卫兵”顶着说。

“我是清乡局的，请照顾！”一个地主赶紧亮出自己的身份。另一个地主也忙说：“我也是清乡局的。”

“清乡局？为什么到这时才见我们长官？”

“小人知罪！小人知罪！”

方志敏微微一笑，说：“算喽！算喽！两个地主受宠若惊，赶紧设宴，邀请“长官”赏光。

在酒饭桌上，方志敏对地主说：“你们怕方志敏，方志敏有什么？没长三头六臂吧？我们大军一到就要他的好看。你们告诉我，方志敏是个什么样子，到时候我给你们抓来，保你们太平无事。”

这可难了。两个地主对方志敏只闻其名，未见过其人，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只好回答说：“大军一到，不怕方志敏长翅膀飞上天！”方志敏听了，一阵哈哈大笑。笑完，脸色突然一沉，严厉地说：

“为配合大军行动，今天晚上8点钟，在周家祠堂商谈军机，由你们两人负责，立即通知各村要人，准时到达，倘有不到，唯你们是问！”

时近8点，漆黑的旷野里，路上灯笼点点。

8时已到，周家祠堂里的八仙桌旁，围坐着十几个地主豪绅。大家都伸着脖子盯着大门外，静等“长官”到来。

“立正！”大门口“卫兵”一声喊，豪绅们顿时紧张起来。方志敏刚跨进大门，豪绅们一个个赶紧作揖打拱，点头哈腰。

“都来了吧？”方志敏问道。

“都来了！”负责通知的那两个地主笑嘻嘻答道。

“点名！”方志敏转身对一个“卫兵”说。

点完名，方志敏说声“请稍候”，便走出大门。十几个地主豪绅直楞楞地目送着他。忽听得一阵哨子声，祠堂四周“杀”声骤起，从大门外涌进无数手持梭标土铳的赤卫队员。豪绅们立时被这突如其来事变吓瘫了。

“你们助纣为虐，反攻倒算，罪大恶极，百姓要惩罚你们！”方志敏走到他们面前宣布道。十几个地主豪绅这才明白：原来这位长官正是令他们谈虎色变的方志敏！

1930年6月上旬，信江特委根据方志敏的提议，开会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决定独立团乘胜出击景德镇，开辟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整军扩编，准备夺取更大的胜利。

景德镇是中国“瓷都”。攻打景德镇，其政治、军事、经济意义重大。因此，特委派人到景德镇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一方面侦察敌情，另一方面力争“里应外合”。

方志敏决定召开军委会议，认真讨论独立团攻打景德镇的重大军事行动。会议决定“要速战速决，力避强敌，智取为上”。

7月4日清晨，红军独立团1000多人集结在芳家墩村的草坪上，方志敏作了战前动员后，急速向景德镇方向进发。部队抄小路过乐平，经闰口，一举消灭了许英保安团，于5日赶到乐平和德兴交界的段家村。部队吃过晚饭后，沿安徽边界南下，向100里外的景德镇进发。山路崎岖，加上连日大雨，行军非常艰难。方志敏全身湿透，同大家一起，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中间。队伍在雨中飞奔，翻山越岭，渡河过溪，终于在6日拂晓前赶到了离景德镇5里路的里村。里村的党组织早已做好策应的准备，部队按计划分四路同时向景德镇的各据点展开包围。

部队进入景德镇市区时，街上静悄悄的，敌人丝毫没有察觉。当龙志光率领的先头部队冲进浮梁县政府大门时，敌人还客气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战士们早已蜂拥而上，把哨兵缴械。当红军战士毫无阻拦地冲进敌人营房时，一个个老爷官、老爷兵还在酣酣大睡，大概正在做发财梦呢！

红军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地拿下了浮梁县政府，其他敌人据点也是如此。这次奔袭景德镇共缴获枪枝 413 支。景德镇的所谓“三尊大佛”、“十八罗汉”以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也大部落网，没收黄金、白银、现金 100 多万元。

这一仗的胜利，使红军独立团的声威大振，部队人数扩大到 4000 多人，装备也大大加强。根据地扩大到赣北，苏区纵横 500 余里，人口达 100 多万。

五、逆境奋战 驰骋四省

1930 年 7 月 10 日，唐在刚在景德镇召开的信江、赣东北特委联席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指示”，即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报告内容。中央要求赣东北红军立刻去执行攻打九江的任务，说是那怕“丢了信江根据地，也要西越鄱阳湖，饮马长江水，去配合全国革命高潮。”

赣东北红军原计划北进，攻打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皖赣、浙赣交界地带。而现在却要西攻敌人重兵据守的重镇九江，从当时红军的实力和条件看，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

方志敏对这样的中央指示不免表示怀疑。他提出先将部队开回苏区根据地整训，然后再考虑出击的合理建议，但被否决。

7 月 21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红十军，方志敏在乐平界首村主持建军大会，周建屏任军长。

8 月 1 日，方志敏在弋阳主持召开赣东北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任革委会主席。

9 月 9 日至 15 日，在红军分三路向九江进发不久，在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上，为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合并成立赣北行动委员会，方志敏却被排斥在行委常委之外。

这时，敌人趁红军远征，赣东北苏区空虚而大举入侵，方志敏果断地调红军一个主力团，保卫了苏区，并指挥这个团消灭了靖卫团。同时，他还创办了“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扩大苏区对外贸易，以打破敌人经济封锁。

不久，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包括县靖卫团外，蒋介石还调集 3 万多兵力，集中对江西和其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赣东北苏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这时，党中央特派员来到赣东北，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于是赣东北行委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方志敏下令红十军即刻返回赣东北苏区，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1 月下旬，红十军回师苏区，在方志敏指挥下，连续打了 4 个漂亮仗：第一仗，诛仙桥遭遇战。这一仗，共毙敌 150 多人，俘虏 40 多人，缴枪 200 多支，给“围剿”的白军当头一棒，甩掉了敌人的尾追和堵截。

第二仗，袭击上饶城。红军内外夹击，歼敌 500 余人，缴枪 500 余支，县长逃走，警卫团总被击毙。

第三仗，攻打河口攻坚战。这一仗打得艰苦，红军以伤亡 42 人的代价，

毙敌 500 多，大部敌人成了俘虏。缴获也是空前的，计迫击炮 4 门，各种枪支 800 多支，大量子弹和军需物资。

第四仗，弋阳七星尖伏击战。红十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利用那里山回路转的地形，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全歼敌人一个营，缴获机枪 12 挺，步枪 400 多支；同时，又围歼了增援的敌人，活捉敌人一个团长。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在赣东北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1931 年 1 月，红军得到很大发展，装备明显改善，军队素质也有提高。同时地方武装也相应发展壮大。因此，完全有能力对付敌人 2 月发动的第二次全国性“围剿”，并将它粉碎。

可是，新任红十军政委涂振农，面对强敌慌了手脚，毫无办法，还制造“奇谈怪论”。他没有心思与敌人作战，只想一跑了事！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烧杀抢劫，横冲直撞，苏区的范围一天天在缩小。

方志敏见情况危急，非常痛心，当即建议召开特委会，挽救危局。特委会批判了涂振农的逃跑主义思想，决定由方志敏接替涂振农，代理红十军政委，并得到中央批准。

这时，闽北告急！闽北党的负责人和部队干部有的调走，有的牺牲，部队被围困在山区几个小村子里，弹少粮缺，处境十分险恶。方志敏等立即召开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南下福建，急解闽北之围！

方志敏率领红十军进入闽北，连打 11 仗，每战皆胜。闽北根据地全部收复，并奠定了发展基础。完成任务后，方志敏立即回师，执行新的任务。

六、忍辱负重 苦撑危局

在方志敏入闽作战期间，党中央派万永成、倪宝树来赣。不等方志敏出征归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特委扩大会。会上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内容，要求贯彻王明路线，彻底转变立三路线；又批判赣东北党组织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会后特委进行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永成任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方志敏仍为苏维埃主席。

方志敏一向胸怀坦荡，既坚持原则，又顾全大局。尽管对中央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他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一手抓法制，一手抓财经。他领导全区农村掀起夏收夏种夺取 1931 年大丰收的热潮，以收获更多的粮食来支援战争。

1931 年 7 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全国性的“围剿”，他调集 1.8 万多兵力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策略，从南北两面向赣东北根据地发动进攻。在这危急时刻，王明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又派来了代表曾洪易。这个中央代表比前两个来头更大，更飞扬跋扈，因而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曾洪易来到葛源的第三天，就从组织入手，对特委实行大换班。整个特委领导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他们全面推行王明路线做好组织准备。

曾洪易在组织上、政治上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之后，就在 9 月 1 日主持召开赣东北第一次党员大会，由他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先讲国际，再讲国内，最后才讲到赣东北。在讲到赣东北时，几乎尽是指责，把赣东北工作说得一无是处。因此，在讨论曾洪易报告时，大家就针锋相对，一条一条地批驳起来。

方志敏参加了讨论会，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在特委会讨论“决议”

案时，方志敏驳得曾洪易理屈词穷。但是曾洪易握有“国际路线”这把尚方宝剑，不能以理服人，却能以势压人。

这次党代会还决定成立赣东北省委，方志敏虽然当选为省委委员，但被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曾洪易一意孤行，给赣东北苏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赣东北第一次党代会之后，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敌人对赣东北已成合围之势。

大敌当前，方志敏怎能坐视不管！于是他向曾洪易建议：要采取强有力的军事措施，以对付强敌的进攻。但遭到曾洪易毫无道理的指责。他同时宣布：方志敏今后不能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擅自调动军队，红军是党的，由党指挥。实际上，就是要由他曾洪易一个人指挥。

至此，在敌人进攻面前，方志敏完全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以后红军就按照曾洪易的一套办法，敌人堡垒修到那里，红军就开到那里去打。尽管如此，红十军的干部战士仍表现出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但这样却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单是打贵溪夏家岭的一个堡垒，就连续组织4次进攻，伤亡1000多人，好几个县、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壮烈牺牲。红十军遭到空前的灾难性损失。

在曾洪易“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赣东北苏区未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也未能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这时，赣东北苏区只剩下不多的地盘。白军撤出后，方志敏心情十分沉重，他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收拾残局，扩展根据地，恢复政权。11月27日，他主持召开了赣东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当选为主席，并兼任财政部长。他领导苏区人民坚决实行开源节流，发展生产的方针，赣东北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可是，曾洪易并不服输。他大搞清查运动，清洗与他意见不同的党员和干部；同时修改土地法，实行“消灭富农，打击中农，团结贫农”的极“左”政策，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农村统一战线，增加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力量。

不久，又一场更严重的灾难降临到赣东北苏区，那就是曾洪易卖力推行王明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给苏区广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带来深重的创痛。

1932年3月间，曾洪易把肃反运动当作一项中心工作，在赣东北苏区全面铺开。一时弄得整个赣东北苏区乌云翻滚，天昏地暗。曾洪易手握生杀大权，将那些同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概以“AB团”、“改组派”、“第三党”对待，从而逮捕杀害了许多赤胆忠心为革命的好同志。

吴先民是弋横暴动主要领导之一。就因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曾洪易持不同意见，对曾洪易的跋扈横行表示不满，几次与曾发生争论，便成了这位“中央代表”的阶下囚。

曾洪易从吴先民家搜去的日记本上，记有赤色警卫师和上饶县各区委书记、区苏维埃主席的名字，硬被当作“改组派”的名单。曾洪易按名单拘捕并严刑拷打这些同志，得到口供便杀人灭口。吴先民曾被敌人关押，后越狱逃跑，此事却被诬为被敌人收买后而释放出来的。

方志敏等极力为吴先民辩护，却被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迫他们写检讨书，公布于众。

吴先民受尽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坚决不肯招供。最后

仍被诬为“罗章龙派”、“兄弟会”、“AB团”，以及一贯反对国际、反对中央、反对省委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开膛破肚，残酷处死，又割下首级示众，使忠贞之士含恨九泉。

然而一手制造冤狱的曾洪易，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杀气腾腾，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由党委到军队，从机关到农村，由赣东北到闽北，全面开展。红十军参谋长舒翼，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闽北苏区创始人陈耿、徐福元，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县委书记或其他干部，带兵起义的白军军官，派往白区的秘密工作干部，也多被杀害。余干县警备大队长、中共地下党员罗英，率100多名警备队士兵及其家属起义投向苏区，却被曾洪易以“AB团”的罪名全部枪杀。仅弋阳一县就设监狱17所，关押1100多人，被杀害300多人，其中9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1个。

1932年7月蒋介石又集中19个师的兵力发动第四次全国性“围剿”，其中以8个师、36个团的兵力进攻赣东北。敌人使用兵力之多，装备之精良，都是前所未有的。

曾洪易这次仍不接受教训，依然采取硬拼战术，叫红十军四出应战。结果，从7月到9月的两个月时间里，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赣东北根据地又面临倾覆的危险。

不能眼看着这样失败下去！方志敏又去找曾洪易商量。结果是一场争论，双方都提高了嗓门，互相拍桌子。在不少领导干部的劝说下，曾洪易才勉强同意召开省委会，“统一认识”。会上一致同意：方志敏重任红十军政委，组织反击第四次“围剿”。

这时，中央命令红十军二进闽北，扩大闽北苏区，使之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进而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为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领导责任又自然落在方志敏肩上。

1932年9月12日，红十军到达武夷山麓的紫溪。第二天，方志敏与闽北党、军领导人共同制定作战计划后，立即开始行动。15日，攻占闽北赤石和星村，消灭福建刘和鼎部的1个团和另外1个营，首次缴获电台1部。20日又攻克浦城，全歼守敌2个团。23日，回师赣东北，在武夷山区马鞍山，又歼敌1个团。接着在车盘一带与敌七十九师激战，击溃敌人3个团，打破了敌人以重兵拦截红军归路的军事企图。10月2日，回到中心苏区。完成预定的作战计划。

12月，中央苏维埃决定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主席。此后，红十军东向浙江，北出皖南，巩固和发展皖、浙、赣边界苏区，并准备配合中央红军，彻底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可是，事发突然，王明路线控制的党中央于1933年1月25日电令：将红十军并入中央红军，邵式平、周建屏、方志纯等同志都随军去中央。

1月25日，正是阴历大年三十，红十军4000多人，渡过信江，前往贵溪上清宫，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师。方志敏特地赶到鹰潭附近的信江边，给全军战友话别送行。他和周建屏、邵式平、方志纯一次又一次地握手，一遍又一遍地叮咛，不忍分离。

天色越来越阴暗了。浮桥上的战士们，和纷纷扬扬的白雪融成一色。

已经走远了，一向以铁汉子自豪的邵式平，也不免一再回头张望。方志敏，披着一身洁白的雪花，仍久久伫立在江边。

红十军调走了，为了应付闽浙赣省面临的困难局面，方志敏组建新的红

十军。他以赤色警卫师 1500 人为基础，抽调各县独立团、营的部分人、枪，抽调省、县两级工会的 90 多名巡视员任连、排长，编成二八师、二九师、三师，组建了新红十军；又在全省开展以扩大红军为中心的“春季冲锋运动”，一下子就扩军 3000 多人，给新红十军和各县区的独立团、营、游击队补充兵员。新红十军由匡龙海代理军长，聂洪钧任政委。匡龙海熟知方志敏的战略战术，有一定的指挥作战的实际经验，这就使反“围剿”能够按方志敏的部署和打法进行。

这时，到达中央根据地的红十军，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消灭敌人 1 个团后，又牵制敌人 3 个师。方志敏乘此机会，于 2 月 17 日，在弋阳、贵溪地区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随之又转到浙西，攻克开化。接着，又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了苏区。2 月底，红十军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开辟了闽浙赣苏区的信（江）、抚（河）分区，方志敏乘势率部，会同贵溪独立营、游击队消灭了敌人第四师和二十一师各一部，从而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赣东北的形势趋于稳定。可是作为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央代表曾洪易，却又发起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弄得从上到下，从地方到军队，从干部到群众，个个心神不安，人人自危。

9 月，蒋介石集合 100 万军队发动第五次全国性的“围剿”，其中以 10 万兵力进攻闽浙赣根据地，采取层层筑堡，步步推进的新战法。这对赣东北来说，其实也并不新鲜，在第三次“围剿”时，他们就用过。可是曾洪易根本不接受血的教训，还是老一套办法，又叫新红十军去硬攻敌人堡垒群。战场上不断传来新红十军受损失的消息。

1934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来电指名要曾洪易前往参加会议。会上，方志敏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曾洪易走后，由方志敏任闽浙赣省委书记。他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对曾洪易的错误展开严肃批评，统一认识，制定了“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战略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由于进行了许多工作，使根据地内部趋向稳定，工作出现了新的生机。军事上，一支支地方武装代替了红军正规部队活跃在敌堡群中，打而不攻，枪声不断，叫敌人日夜不安；一个个地雷阵，摆在根据地四面八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新红十军则忽东忽西，出没不定，叫敌人难捉摸。于是战局开始松动，形势出现了转机，一些被敌人占领的苏区不仅收复了，而且还扩大了；皖南新根据地也有很大发展。同时闽北工作也有新的转变和起色。

这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却多次来电，批评方志敏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责令方志敏必须坚决执行“不失苏区一寸土地”，“以赤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的六中全会决议。

这样方志敏只好去领导修筑赤色堡垒并将新红十军从皖南再调回来。军民大筑“赤色”堡垒，以对付国民党的白色堡垒。

一切为了前线！但前线还是顶不住，敌众我寡，难以击退敌人。英雄的红军，不屈的人民，用自己的血肉，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悲歌。

闽浙赣苏区军民，尽了最大努力，做出了重大牺牲，却没有能够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七、北上抗日 壮志未酬

由于蒋介石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倾全力以“剿灭”革命的工农红军，导致日寇大举入侵。在这国家濒临灭亡的严重关头，党中央发来了北上抗日的战斗号令。

1934年10月初，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组成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出击，开辟新区，北上抗日。遵照军委的命令，先遣队与闽浙赣苏区的新红十军及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了红十军团，由刘畴西任军团长。为了统一领导和创建新苏区的全盘工作，又成立了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军行动。

先遣队最初从瑞金出发时，正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中央革命委员会赋予先遣队的另一项使命即是要吸引和调动一部分敌人，以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方志敏深感此次受命责任重大。红军北上抗日，直入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甚至逼近其首府南京，蒋介石必然调兵遣将，从而将导致恶战频繁。但他抱定决心，只要救国利民，决不计较个人艰难险阻。由于近来痔疮病发作，每日血脓不断，不但骑马困难，卧床也不安稳，但他还是忍着病痛出发。他说：“我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

方志敏于11月初抱病到重溪和十军团领导同志共同商定部队合并整编的干部配备和行动方向后，又马上回到葛源部署今后苏区的斗争，走访乡亲，组织疏散，……忙得马不停蹄。

红十军团都是老十军和新十军的子弟兵，他们就要远离家乡出发了，当地群众——实际上只是留下的一些老弱妇孺，都来为他们告别送行。在最困难的岁月中，正是这些老弱妇女，亲送自己的儿子、丈夫参军，组建成红军；是她们为我们的游击战士送水送饭送寒衣；是她们把自己用血汗浇灌出来的粮食油棉，慷慨无私地奉献给了革命战争。方志敏尽管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可是面对眼前这充满忧伤和疑虑的一张张熟识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揪心地痛苦。红军就要走了，等待着这些老区人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他心里为此不断地默念着。

他强忍着眼泪，叮嘱老苏区的群众，目前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是我们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前途是光明的。等我们打败日本狗强盗，恢复大好河山，一定再回到家乡故土来，重建家园，让我们世代安居乐业，共享太平。

夜深了，方志敏夫妻仍在相对而坐，心有千言万语，两人却静默无声。此时缪敏已怀胎十月，即将临产，丈夫要离家，部队要远征，前途坎坷，不可预料。

丈夫最理解妻子的心思，还是方志敏先说话：“你快要生孩子了，我不能在家照顾你，只有你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们的子女多，是不是分散到可靠的亲友家寄养，比较好些？”

妻子听了丈夫体贴的话语，显得非常平静。她说：“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安排好。倒是你的肺病，恐怕还会复发，千万要自己注意。还有，痔疮会发得厉害，这行军打仗……”她话未说完，那忍耐已久的泪水便一下子涌了出来。

方志敏不知如何安慰妻子，只是轻轻地抚摸她的秀发，紧握她的手，给她擦去泪水……。

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1月24日，方志敏和妻子依依道别，率领作为